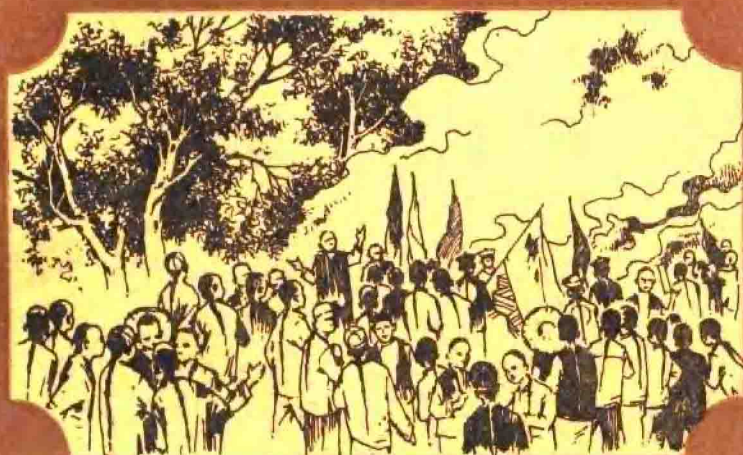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美〕张馨保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美〕张馨保 著

译者：徐梅芬 刘亚猛

许罗迈 萧致治

叶大波

审校者：林纪焘 萧致治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福州

林钦差与鸦片战争

〔美〕 张馨保 著

译者：徐梅芬 刘亚猛

许罗迈 萧致治

叶大波

审校者：林纪燕 萧致治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省煤研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9.75印张 4 插页217千字

1989年 5 月第1版

1989年 5 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11—00657—9

K·50 定价：4.00元

译者前言

自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在英美出版的研究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的多种专著中，张馨保著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是问世较早的一本，而且发行很广，影响颇大。英美学术界公认其是研究鸦片战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美国著名的中国近代史权威费正清推崇作者“治学严谨”，“孜孜于追求历史真实”，赞扬此书“对鸦片战争的起源所作的叙述比迄今为止任何语种所作出的叙述都更为全面、更为公正”（见本书费所写前言）。

鸦片战争究竟是怎样引起的？百多年来，在学术界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大问题：有的提出鸦片战争是中西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认为是因中外贸易“被严格地限制于广州一埠”（赖得烈：《近代中国史》中译本第47—48页），战争目的是要“在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的未来方式”（马地臣语，转见《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中译本第193页）；有的则竭力否认鸦片战争是由于英国贩卖鸦片引起的，断言“战争的原因是磕头，是中国妄自尊大的主张”，正如茶叶被抛入波士顿港不是北美革命的原因一样，英国鸦片商人输入的几千箱鸦片由于违法而被中国政府收缴也不能成为战争的原因（《约·奎·亚当斯回忆录》Ⅰ，第30页）；有的甚至提出把“鸦片”二字作为前缀加在“战争”前面是荒唐的，因为作为战争结果而签订的《南京条约》，“在任何一条上都没有提到鸦片”（莎坚特：《英国通商与外交》第87页）。

针对这个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本书作者依据国内外新发表的

资料，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他从中英的早期接触入手，深入分析了广州的中外贸易制度和中英外交往来中的多年争执，特别详细地探讨了治外法权与鸦片贸易的兴起，以及围绕鸦片问题中英之间展开的日益激化的斗争。作者认为：“跟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鸦片战争并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见《作者自序》）。他承认文化差异在中英关系上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忽视旧的广州贸易制度的不完善处，不否认某些做法的不合理，以及清朝官吏的腐败无能；但是他强调指出并且反复论证：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鸦片贸易是中英商业往来中最重要的一环。鸦片贸易的惊人发展，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日益加严的种种措施，杜绝这种贸易。“是鸦片贸易的停滞，使马他崙海军少将于1838年进入中国海域；是威廉·查顿（按：当时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几乎一手策划了1839年远征中国的计划。在有名的《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中，鸦片问题是主要议题”（见《作者自序》）。英国由于从鸦片贸易中得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利益，竭力推行鸦片贸易政策，维护鸦片贸易，执意取得治外法权；中国则因鸦片贸易和治外法权，给国家、民族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祸害，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禁绝鸦片贸易，维护国家主权。因而，“把其他因素都考虑在内，仍然可以这么说，鸦片贸易和英国执意要求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导致1840年冲突的直接根源”（本书第7章）。作者引人入胜的历史考察，令人耳目一新。读了本书，人们将会自然得出结论：尽管战前有导致战争的多种因素存在，但鸦片贸易与治外法权问题则是促使战争爆发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把这次战争称之为“鸦片战争”名符其实，“毫无不妥之处”（见《作者自序》）。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林则徐是第一位反殖爱国的民族英

雄。如何正确评价林则徐，是研究鸦片战争的又一重大课题。在已往国外学者的著作中，有些对林则徐曾作了较高的评价，也有些批评林则徐无知、自大甚至顽固。例如：道格拉斯在《欧洲与远东》一书中，指责林是“用轻率而积极的措施驱逐了外国商人”，并认为“林引以为自豪的措施被证明比没有用还要坏”；庄廷龄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则把英国悍然发动战争的责任归罪于林则徐，说是林的“误会和自高自大导致战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则指责林推行严厉的禁烟政策，“使他的祖国陷入一次灾害的战争”。张馨保不囿成见，尽可能避免故意的偏见和片面性，努力遵循历史学者的职业道德，对林则徐作了近乎历史实际的评价。他赞扬林是“以他的勤奋、改进政府工作的强烈愿望以及全力为民谋利的信念而著称”；他肯定林是一个公正廉明的改革者，认为“林则徐的政治活动是不能以追逐个人名利来解释的。他对于实行改革的关注胜于他对个人仕进的考虑”；他认为林是当时最有才干和魄力的能员，“在整个道光年间，每当在治水、海运、盐政、军务等方面出现了麻烦，需要派员前往处理时，考虑到的人选往往是林则徐”。收缴鸦片是禁烟运动中一场重要的斗争，林采取了监禁外商措施，逼使他们缴出2万多箱鸦片。张认为林到广州后仅仅两个星期就采取这种果敢行动，“主要是由于中国水师无力执行他的命令而采用的。中国人只有拘押外国人作为人质才能收缴到鸦片”（以上均见本书第5章），“无论如何，没有这样严厉的手段，或用一般的政府措施，林是毫无疑问地不能如是成功地禁止鸦片贸易的”（本书第6章）。此外，张也指出了林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与失误，如“过份地依照儒教的是非观点和道德观念办事”，鄙视与英国贸易，相信英国政府不会支持在中国的鸦片商贩，对外关系的概念落后于时代，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到广州是为了发号

施令而不是谈判”等（参见本书第5、7章）。应该说，这样的评价基本上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对于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张馨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人。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外交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曾国藩和李鸿章早二三代人的时间，林则徐就已提倡和发动了向‘蛮夷’学习的自强运动。当然，他是个比曾国藩更为深刻的思想家，但又是个不如李鸿章那样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如果说，曾李二人精于完成可行之事，那么林在预见势在必至之事方面却超过他们二人”。张认为“林则徐的使命不仅仅限于事务性的鸦片问题。……他的广州之行是为了建立一项新的外交政策，为了广州贸易制度改革或为更现代化的机构打下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了同西方不可避免的、日益增加的接触作好准备。从这个更广阔的意义来看，林则徐并没有失败。鸦片战争大炮的轰鸣把一个沉睡了几百年的帝国震醒。这场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开始了新的纪元，中国人民由此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难道今天中国人不是仍然沿着这条道路行进着，以对付西方不停的挑战吗？”（本书第7章）他能站在这样的高度，纵观林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失为一种远见卓识。

此外，对于邓廷桢的评价，张馨保也力求符合历史事实。在人们的心目中，1838年以前，邓廷桢不但是一个弛禁派，而且贪赃枉法。这样就很难理解，在道光帝决心禁烟并派林则徐前往广东查禁时，邓为什么那么快地转变成为一个严禁派。张针对这个问题，根据国内外有关资料，对邓廷桢从1836年到广东后的三年历史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一方面指出了许乃济提出弛禁主张后，邓一度确实赞同弛禁；另一方面，当不久之后道光帝明确表示不能放弃禁烟决心时，邓就开始执行严禁政策了。邓接到了道光帝的

禁令后，就会同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命令行商据实查报许球在奏折中提到的九名外国烟贩，并命令他们在两个星期内（后来延期）离开广州。与此同时，对中国鸦片走私者也发动了狠狠的打击。在以后的两年中，邓主持下的广东当局“丝毫没有放松对鸦片烟贩的严厉措施”。“到1838年12月，据估计已有两千多鸦片商、窑口老板和抽鸦片者被关押，每天都要处死几名烟犯”。至于贪污受贿，张经过考究后指出，“几乎可以肯定，邓廷桢贪赃枉法一说毫无根据”（以上引文均见本书第4章）。在肯定邓廷桢早就执行严禁政策的同时，张也指出邓的弱点，“邓对禁烟的种种措施主要都出之于职责所在和讨好皇帝，并非出于义愤或基于崇高原则的进军。因而他会附和许乃济的弛禁建议。他对属下的管束不严应归之于他对政务没什么兴趣，只喜欢搞搞学问”。这种不先入为主，敢于据实否定前人不正确论点的做法是可取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部书最可贵的是大量引用了稀见的外文资料。作者在研究中，广征博求，查阅了很多当时目击者的记述、私人书信、官方文件、报纸报道、英国和美国各公司的记载，并进行了仔细的鉴别，从而使不少事件真相大白于世。

作者是美籍华裔学者，曾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对鸦片的祸害有深切的感受。由于他既掌握了中文资料，又大量阅读了英美资料，并且自认为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写此书的，这种特殊地位和身份使他“能既从英国一方又从中国这一方来撰述这段历史”，因此既可吸取双方的长处，又可避免单据一方的片面性，为写好本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然，这部书也是有缺点和不足的。比如作者提出林则徐成功地没收了英国人手里的全部鸦片，仅仅是一种“虚幻的胜利”就值得商榷。作者的理由是，“没收鸦片并未使中国得到好处，却为英国当局后来的报复提供了借口”（见本书第6章）。不

错，英国政府确是以中国禁烟作为借口发动战争的。但这仅仅是“借口”而已。英国决心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这个方针早已决定，而且在舆论上、策略上以及具体准备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战争迟早会爆发。即使没有这个借口，英国也会寻找别的借口。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就找到了亚罗号事件作为借口。退一步说，鸦片在中国流毒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以前曾经采取种种措施，左禁右阻，都没有取得显著效果；这次由于林则徐的果敢行动，一举收缴了全部鸦片，不但清洗了多年的耻辱，而且大大振奋了中国的人心，改变了中外的视听。凡是有点正义感的外国人，无不赞叹不已，这是正义对邪恶的胜利。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不但当时就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来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直到今天，人们都还引以为豪！这应该是政治上的大胜利，怎么能说是“虚幻的胜利”呢？！再如谈到义律缴烟的动机，作者认为，义律交出鸦片，“与其说是被迫的，毋宁说是蓄意的”。据此推论，义律缴烟完全是有意设置的一个圈套。林则徐迫令缴烟，正是中了义律的圈套。这也是一种倒果为因的说法。我们并不否认，义律交出鸦片后，为了变被动为主动，确曾利用林则徐迫令缴烟竭力煽动英国政府发动战争，但这只是以后的事情。而在这当时，主动者是林则徐。命令鸦片贩子交出鸦片，是林则徐的决定；鸦片贩子拒不缴烟，从而对外商采取监禁措施，这也是林则徐的决定。义律迫不得已，才交出鸦片，这怎么是义律设置的圈套呢？！又怎么能说，“与其说是被迫的，毋宁说是蓄意的”呢？！当然，瑕不掩瑜，这些终究是次要的，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但指出来明辨是非，以免混淆视听，也是必要的。

本书的第5、7章是1982年福建师范大学的同志为在福州召开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而翻译的；后来，为了纪念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徐梅芬副教授与我把其余各章翻译出来。全

书的翻译工作具体如下：

译者：

第一章至第四章	徐梅芬	(武汉大学)
第五章	刘亚猛 许罗迈	(福建师范大学)
第六章	萧致治	(武汉大学)
第七章	叶大波	(福建师范大学)
附录	徐梅芬	(武汉大学)
地图译制	林纪焘	(福建师范大学)
	王 涛	(武汉测绘大学)
审校者：	林纪焘 萧致治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敬望批评指正。

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曾得到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林子东和其他同志、福建师范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校系领导、福建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萧致治

1987年11月25日于武汉大学

序*

1839年岁暮，一种无可挽回的征兆笼罩着广州。人们预感到中英之间的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因为一种不断扩张的贸易制度与一个停滞不前的文化之间的增多接触所引起的紧张气氛，双方早已心照不宣。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了近代中国的屈辱世纪。本书用历史观点客观地对待这个问题，并详细叙述了导致敌对行为的逐次危机的演变。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广州的对外贸易已成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有节制接触的唯一渠道。正由于这个原因，它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所在。张馨保先生探讨了广州贸易制度和英国对华贸易的发展——这种贸易对于英国是如此宝贵，以致英国不惜发动战争来推翻广州那种窒息的制度，尤其是战争的对方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日渐衰微的朝代。中国人则竭力维护这种制度。况且，给人民健康和道德以及国计民生以破坏性影响的鸦片贸易使中国人民感到岌岌可危，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禁止鸦片贸易。可是鸦片贸易在19世纪30年代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英国对外贸易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张先生的观点认为，大可不必提起中英两种文化的矛盾，单单鸦片危机这一件事就足以引起一场战争。

通过中英目击者的记述、报纸报道、官方函件、私家手稿、英国和美国公司的记录，以及许多新近获得的文件等等，张先生给我们揭示了在1839年那些决定性的日子里，事件发生的动机和策略。他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关于治外法权的争论，英国为了争

• 这个序刊印于原书的封皮上。——译者

取在中国享受外交平等所作的斗争，在广州受拘禁的外人团体的生活，还有关于呈缴和销毁 2 万箱左右的英国鸦片的问题等等——所有这些促成这场冲突的重要因素。

张先生特别致力于评价钦差大臣林则徐所起的作用，使我们对这位受命去广州查禁鸦片的显赫的钦差大臣的性格、动机和行为有了清楚的和重新的认识。在已往，林则徐曾被人先后评为无知、自大和顽固等等，而张馨保先生则显示出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但又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家，先是受到皇帝的鼓励和赞扬，最后是无情地被迫充当一切中英之间不幸的替罪羊。

张馨保是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费正清

前言

一个多世纪以来，通常作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鸦片战争，使中国爱国者愤懑不已，亦使正直讲良心的西方人局促不安。今天，在大陆中国，鸦片战争不单用来证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罪行累累，而且特别用来证实这一马列主义理论，即：自由企业资本主义发展为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它勾结当地反动的“封建主义”势力，危害各国的普通老百姓。吸食鸦片有害以及林钦差取缔鸦片贸易直接引起鸦片战争这些明显的事实，加剧了近代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反感和愤懑。

没有任何文学虚构能比种种历史事实本身更生动、更明晰地描绘出中国人民所遭受的迫害和凌辱。与之相比，当年为了反叛英国专制制度，美国殖民地人民所受的委曲，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就产生了这么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对鸦片的毒害没有作出更为强烈的反应呢？

慎思好问的学者会发现：鸦片战争远不是二二得四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用几句话就能说得清。他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英国不来侵略，其他西方国家也会来侵略中国；即使中西关系史上没发生战争，今天中国的爱国者仍然会愤懑不已。这些论点是根据这一基本事实：中国文明是依他自己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方式发展的。但是到了1840年，面对扩张的西方，它已无力自支，应付不了。一百万左右的满人竟然统治着三亿中国人，这就标志着中华帝国制度上的异乎寻常之处，这就使

它跟现代的民族国家或跟今天的中国的做法迥然不同。随着成熟较晚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今天的中国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有强烈的蒙辱之感。

传统的中国文化优越感，或文化主义，加深了近代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除非用理智的剖析和观察来消除她对这段历史的愤懑和怨恨情绪，近代中国才能调整做法，适应多国体系，作为国际社会一成员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敢肯定。因为旧中国文明的衰落沉沦和革命化转变，对于其参与者来说，都是史无前例的悲剧，而且这悲剧一直在延续中。但是，很明显，需要历史学家对事件作出合理的分析和不动感情的理解。自然，这必然是个人的评价，这个工作不能只象个法官高高在上坐在那里，而应象个见证者，聆听各方的辩词，捕捉和再现每个主人公所处的环境、每个主人公的情绪、想法和信念。写鸦片战争要做到这一点，委实不容易。

张馨保多年来治学严谨，努力培养自己的史学研究能力，掌握中文和英文资料写出了这部作品。尤其可贵的是他孜孜于追求历史真实，而不是先入为主地写作。他运用了最近发表的，中方主人公林则徐钦差的日记，他也阅读了英美商人的档案，其中包括存放在剑桥大学的经营对华贸易的主要商行怡和洋行的函稿帐簿。这些西方的档案和记载证实了我们已知的历史，但张博士深入研究迄今尚未用过的中国史料，对鸦片战争的起源所作的叙述比迄今为止任何语种所作出的叙述更为全面、更为公正。总的说来，他的这本书有助于对中国与西方间的这个早年的冲突，以及鸦片战争所留给我们的想法和感情上的遗产有一个统一的理解。

哈佛大学历史教授 费正清

自序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性是没有人争论过的。学者们，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也不管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都无例外地把鸦片战争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史的起点。自从1949年的共产党革命以来，中国的研究工作者和名作家比以往更为重视、更为强调这次战争。过去十年里，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真是令人印象深刻。除了较严肃的著作外，1958年初，还写了题为《林则徐》的历史剧本，不久又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

1954年，由齐思和教授精心主编，出版了《鸦片战争》这不朽的六卷本资料汇集，搜集了中国一方所掌握的鸦片战争资料。三年后又相继出版了重要文卷《鸦片战争文学集》。在这些文集里，以及在最近新建的博物馆和档案馆里，许多最重要的资料被发掘出来公之于世。其中大部分在以往是一般人休想见到的。的确，这些资料是如此有趣，如此有价值，以致阿瑟·魏莱搁下他的纯文学活动而写了本鸦片战争的书。

在西方，近年来同样卷帙浩繁、同样重要的文集也向公众开放了。有名的怡和洋行档案、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的福士和赫德文集、国会图书馆的拉蒂默文稿、罗德岛历史学会的卡林顿手稿以及其他许多档案资料都有待这一代历史学家深入探讨和研究。这些新的资料以及共产党作者对鸦片战争的日益重视，都使得人们对鸦片战争进行新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和必须。

跟其他历史事件一样，鸦片战争并不是某一个因素造成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从理论或概念上说，这是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当两种各有其特殊体制、风格和价值观念的成熟的文化相接触时，必然会发生某种冲突。使英国人同中国人相接触的是商业，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商业最重要的一环是鸦片贸易，而中国竭力想取缔这一贸易，这是战争的直接原因。

许多作者坚持认为，鸦片贸易只是引起战争爆发的导火线，而战争的起源完全在于文化上的差异。这个论点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还是站得住脚的。但是，历史学家也必须考虑其他因素，考虑直接的诱发原因。奉劝那些没有研究过这些原因的历史学家去翻阅上面所提到的大量材料，它们对鸦片商的活动和中国官员的抵制，勾画出新的画面。也请这样的历史学家做一些假设：要是鸦片贸易不在中国而在另一个国家——在其文化与英国相类似的国家进行，英国恣意践踏该国法律和禁令而强行销售鸦片，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会避免吗？

也请容许我们问一下：战争在1839—1840年爆发，在鸦片买卖发展到惊人程度，迫使中国人严格执行禁烟令的情况下爆发，难道只是巧合、偶然？为什么不在前此两个世纪爆发？当时，其他类型的危机也可能引起战争的。是鸦片贸易的停滞，使马他老海军少将于1838年进入中国海域；是威廉·查顿几乎一手策划了1839年远征中国的计划。在有名的《巴麦尊子爵致大清皇帝钦命宰相书》中，鸦片问题是主要议题。鸦片贸易与1839—1842年战争之间密切和具体的关系是无法否认的。“鸦片战争”一词毫无不妥之处，而许多人竟不以为然，认为以鸦片命名是不公平的，带有诽谤味道。

我完全承认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我也毫无忽视旧广州贸易制度的不完善处，不否认那种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做法以及中国官员的无能，根本对付不了不断扩张中的英国贸易，这些方面

已由其他作者仔细研究过并恰如其分地评价过它们的意义。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鸦片贸易是导致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这一点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鸦片问题本身就不简单。它涉及法律、道德、政治、经济和行政种种方面。本书不打算追溯那逐年增加的鸦片进口或是随之而来的白银外溢，这个将放在较大范围去探讨。我打算对一些问题作出评价，并写出使得武装冲突不可避免的一系列事件。就深远和持续的恶果而言，没有任何单项的商品比鸦片戕害更多的中国人。我在中国的几十年里，亲眼目睹数以百计的同胞和我的许多近亲备受鸦片的毒害，研究鸦片战争，难以掩盖、抑制我自己的感情。朗克学派的《客观地撰史》一般认为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众多浩繁的史料之库中选择资料时，历史工作者就已依赖主观标准了。我是作为中国人写此书的，但在我研究和陈述过程中，我尽可能避免故意的偏见和片面，并遵循我所理解的历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我也知道，迄今还没有什么充分利用中国资料论述鸦片战争的论文，因此我很高兴能既从英国一方又从中国这一方来撰述这段历史。

得以从事这一研究不仅是由于中国发表了上述的文集，还由于怡和公司开明的做法：准许合格的学生利用存放在剑桥大学的该公司早期的文书档案从事研究。我十分感激他们给我这种特殊的待遇。在这个全球范围关系紧张的时刻，这家在对华贸易中最重要洋行这样做，开创了杰出的、支持相互了解的先例。各方面必须首先现实地剖析和回顾中国和西方国家经历的历史，才可望谈得上国际和谐。我希望对一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第一次同西方建立重要关系开始时的事件的探讨，能使我们大家对造成中西摩擦的一个早期的根源有较好的了解。

我必须向费正清教授致最深的谢意，在写此书的每个环节，